

■ 学人素描

王金南：为中国绿色 GDP 积极探路



王金南是中国第一份经环境污染调整的 GDP 核算研究报告——《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 2004》的主持者兼首席专家。

早期的生活经历，促使王金南一直执着于绿色 GDP、环境经济和环境政策的研究。近十多年来，王金南先后主持完成了近 40 个国家级环境科研项目，其中 10 多项成果居国际先进或领先水平，4 项成果获得了部级和国家科技进步奖。尤其是由王金南主持的“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划研究”，不仅获得了 2005 年唯一的“国家环境科学奖一等奖”，而且也成为我国第一个带有法律强制性的地方环保规划。

◎ 邓聿文

2006 年 9 月，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我国第一份绿色 GDP 核算报告，即《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 2004》。这是中国第一份经环境污染调整的 GDP 核算研究报告，标志着中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研究结果表明，2004 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 5118 亿元，占当年 GDP 的 3.05%。虚拟治理成本为 2874 亿元，占当年 GDP 的 1.80%。

这些数字再次证明，环境危机正在越来越严重地制约经济发展。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不断增长的 GDP 数字，是建立在资源环境和公众健康不断透支的基础之上的。该报告的发布，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由于开创了国民经济核算的另一种途径，绿色 GDP 研究小组也获得了 2006 年度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特别奖，而该报告的主持者兼首席专家，就是王金南。

王金南 1963 年出生于山清水秀的浙江武义县，目前任职于中国环境规划院，为该院总工程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也是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经济学专业委员会主任，2001 年获得中国青年科技奖。

尽管王金南在环境学术界早已声名显赫，但他为公众广泛认知，应该还是对绿色 GDP 的研究。

资源环境危机：绿色 GDP 探索更具现实意义

2006 年 7 月初，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 2004》的项目成果专家评审会。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院士和专家组成的评审组对该项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

专家组认为，项目提出的核算技术和方法体系基本科学合理，为建立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于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专家组一致认为，该项研究是坚持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在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核算方面具有开创性和标志性意义，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有了第一份报告的良好开端，正当大家翘首以盼第二份绿色 GDP 核算报告出炉时，却不意传来其夭折的声音。事后看来，第二份绿色 GDP 核

算报告之所以不能公开发表，表面原因是两大机构——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对公布报告有分歧，后者以技术不成熟和国际上尚未有先例为由不主张公布，实际上是绿色 GDP 核算遭到了一些地方的反对。

一些省市在扣除环境成本后，恐怕经济增长为负数，在当前还是以 GDP 论英雄以及经济增长作为政绩导向的情况下，一些地方领导不喜欢绿色 GDP 核算无疑是。王金南就透露，一些试点省市先后退出了试点。

但是，对绿色 GDP 核算这一新的核算方式，不仅有来自地方的阻挠，也有来自学界的质疑。一些专家就指出，在尚无国际经验的前提下，超前核算绿色 GDP 是否符合国情，核算所依赖的统计数据是否完善，核算方法和技术是否科学等方面。如果不能回答这三个问题，绿色 GDP 核算方式的有效性和科学性确实要大打折扣。

对于这些质疑，王金南从理论基础、核算方法和实际应用等三个方面，全面系统地进行了回应。

王金南认为，绿色 GDP 只是一种大众性提法，绿色 GDP 核算并不完全等同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目前核算出的绿色 GDP，也只计算了环境污染损失，而完整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至少应该包括 5 大项自然资源减成本(耕地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和两项环境退化成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其实，人们对绿色 GDP 争议最大的地方，还在其核算技术与方法的科学性。按照绿色 GDP 技术组设计的核算体系，它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实物量核算，即各类污染物排放量、生态破坏量等实物核算。二是价值量核算，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计算。由于价值量核算涉及资源环境的非市场价格问题，主观性较强，准确度难以把握，有学者认为价值量核算不具有意义。对此，王金南认为，只有进行价值量核算，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绿色 GDP 核算。因为只有把货币、成本型核算的结果，与国民经济核算的内容合并起来，对传统的宏观经济总量进行调整，才能真正体现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环境代价。

除了技术方面的原因外，绿色 GDP 核算要真正让人们信服，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如何。因为，作为一项新的核算制度，绿色 GDP 核算涉及到统计学、经济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领域。要准确

反映资源环境的真实代价，就需要大量的多部门基础统计数据支持。然而我国在有关领域的基础统计数据还比较薄弱。

绿色 GDP 核算的数据支持是否有力?对此，王金南并不否认数据方面存在一些缺陷，但他认为，不能以此为由就否定绿色 GDP 核算的价值。因为“不仅仅是绿色 GDP 核算的数据支持不够，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于基础数据的要求也不能完全满足。”所以他呼吁，统计部门应会同有关专业部门抓紧建立全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和相应的统计调查制度。

既然支持绿色 GDP 核算的数据还不够，以及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也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的情况下，超前搞绿色 GDP 核算，会不会不符合中国实际?王金南认为，日益紧迫的资源环境危机，已使得绿色 GDP 核算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不能因为目前我们对传统国民经济核算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就不能开展绿色 GDP 核算。也不能因为国际上尚未有一个国家官方发布绿色 GDP 核算报告，我们就不能进行这方面的先行探索。

永不言悔：一生欲执着于绿色 GDP 研究

王金南之所以执着于绿色 GDP、环境经济和环境政策的研究，这与他的早期生活经历是有关的。他从小生活在山区，父亲曾是一个兢兢业业的护林人。青山绿水的美景，使王金南对于环境很有好感，当年在填写高考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环境工程，并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

王金南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不仅学习本专业课程，还自学和选修了经济学，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经济管理专业上，如计量经济学、投入产出、国际贸易等，这对他以后从事环境研究特别是环境经济研究打下了扎实的经济学基础。

目前，由于国家经济实力上升以及各级政府、老百姓的重视，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地位正在上升，从而带动了环境经济、政策和规划的研究需求也在快速上升。在这一大背景下，近十多年来，王金南先后主持完成了近 40 个国家级环境科研项目，其中 10 多项成果居国际先进或领先水平，4 项成果获得了部级和国家科技进步奖。

学者研究的目的是“经世致用”，

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被国家采纳，化为政策。王金南也不例外，只是他更有心理准备。他曾说，“每一项环境政策的研究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做政策研究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但是，如果不被相关部门接纳的话，你的大量心血很可能就会付之东流。”

比起其他的研究来，环境问题因为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研究的成果更可能束之高阁。王金南主持和参与的很多研究项目就是这样。比如，1994 年由世界银行技术援助的当时环境政策领域规模最大的“中国排污收费制度设计与实施研究”，他是课题组副组长，负责项目管理、总体方案设计等，到 1999 年，该课题完成，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但直到 2003 年，排污收费制度才在全国全面实施。

当然，随着社会各方面对环境问题的重视，这种情况也正在改变。由王金南主持的“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划研究”，不但获得了 2005 年唯一的“国家环境科学奖一等奖”，而且该规划纲要已通过广东省人大的审议并颁布实行，成为我国第一个带有法律强制性的地方环保规划。目前，深圳、中山和惠州等地市按照该规划已开始或者完成编制相应的地市规划，广东省环保“十一五”规划和其他一些区域性规划也以该规划为基础进

行了编制。

这是令王金南感到欣慰的。他认为，“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划研究”的最大亮点是：把空间布局在环保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规划提出了红线调控、绿线提升、蓝线建设三大战略任务。

其中，红线调控，就是要优化空间布局，把整个珠江三角洲划出约 12% 的陆域面积，这是不能“动”的，如果把这些地区“动”了，珠三角的自然生态系统、大气质量、水环境自然净化等都会遭到巨大破坏，而且难以恢复。

蓝线建设，就是要保障环境安全，在补环保欠账的同时预防新型环境问题，彻底改变区域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局面，重现碧水蓝天净土，把珠三角建成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群和生态城市群。

王金南还和他的同事一同提出了国家绿色发展战略规划的构想。就如何处理生态补偿关系，王金南也有独到的见解。

总之，为了中国的碧水蓝天，为了可持续发展，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王金南在环境政策和绿色 GDP 的研究上，仍将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本期人物话语

李荣融(国家国资委主任)12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指出，鼓励和支持中央企业实现在境内外上市，具备条件的中央企业要实现整体上市；不具备整体上市条件的中央企业要逐步把优良主营业务资产注入上市公司。

多声道

财税政策将发挥稳定物价作用

谢旭人(财政部部长)12月19日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表示，明年财政宏观调控将更加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财税政策将在稳定物价方面进一步发挥作用。运用财税杠杆，大力支持粮油肉等农产品生产，保障基本生活必需品供应，抑制物价过快上涨。做好必需品进口以及储备物资投放等相关财政工作，促进市场供求平衡和物价基本稳定。要密切关注价格上涨对民生的影响，及时落实各项财政补贴政策，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美通货膨胀形势恶化

杰弗里·拉克(里士满联储银行行长)12月19日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发表讲话时说，中央银行的工作是保护货币的购买力，因此需要控制总体通胀水平，而不仅仅是控制扣除能源和食品之后的核心通胀水平。假如能源价格不回落，美联储明年的货币政策决策将会更加困难。另外，明年美国住房市场将继续拖累整体经济，未来几个月里经济增长将是“非常无力”的，但美国经济形势在明年晚些时候可能会有所改善，今年第四季度到明年第四季度的平均增长速度大约在 2% 到 2.25% 之间。而美元疲软和其他地区经济强劲增长促进了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出口增长将是 2008 年美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同时个人收入增加也有助于个人消费开支扩大。

目前粮食市场价格基本平稳

曾丽瑛(国家粮食局副局长)12月20日下午在接受中国政府网在线采访时表示，近期国内市场小麦和玉米价格上涨的原因，主要是季节性需求增加。目前正值小麦销售和面粉加工旺季，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又带动了面粉出口增加，同时玉米价格上涨也使小麦用于饲料的数量增加，因此近期小麦销售数量增加较多。另外，由于今年冬季东北地区气温偏高，玉米脱粒和上市时间推迟，使南方销区玉米市场供给有所减少，价格上涨。虽然近期粮油市场价格有所上涨，但由于中国主要粮食品种供需基本平衡，库存充裕，在国家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后，目前粮食市场价格基本平稳，小麦和玉米市场价格已有所回落。

房市调整不可避免 明年经济增速低于今年

樊纲(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12月20日在“2008 年中国钢铁产业链战略发展与投资峰会”上表示，房地产市场调整将不可避免，但调整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是有利的。我们要坚决防止资产泡沫，一个是房地产泡沫，一个是股市泡沫。另外，明年我国的经济增速将低于今年。尽管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但世界各国央行联手托市，积极干预，因而美国经济不至于会发生大的衰退，预计明年美国经济增速可能回落至 1.5%。由于我国对美国出口占总出口比重已降到 20% 以下，预计美国经济放缓对我国的影响不会太大。

经济学术思潮追踪

经济哲学 致力求解发展为了什么

◎ 梁怡

在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伴生过程中，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得到长足进步，但同时又不间断引发事关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在新世纪的关口，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反身自问：到底经济和经济进步是什么？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会怎么样？21 世纪的经济学家应该研究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经济学——“经济哲学”正成为当今的一门显学。

经济哲学就其本质来看，既不完全属于哲学，也不完全属于经济学，而是哲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产生的、高于经济学和哲学的一门新学科。经济哲学主要关注两类问题：合理评价各经济学说研究范式及其经济学概念；评判社会行为人的(social actor)的行为价值。

经济哲学的产生主要是由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决定的。因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从社会现象中剥离出来的，这些经济现象因经济学家的主观加工而具备了两种性质：一是具有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分开来的相对独立性；二是相对具有了对经济现象进行描述的、客观自在的性质。说它“相对”，是因为对经济现象的剥离过程回避了其他社会现象，是经济学家主观选择的过程和结果。这样，经济哲学便有先天的不自足性，而弥补这种先天的不自足性就需要多门社会学科的努力，哲学便是最能发挥弥补作用的学科之一。

在西方悠久的历史学术发展史中，哲学和经济学大体经历了合——分——合的历程。在早期，经济学和哲学实际就是融为一体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既是经济学家又是哲学家，他们的著述就是早期经济哲学的经典著作。到了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逐步背离了古典经济学的学术精神，陷入了过分数学化的形式主义之中。而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经济学家越来越关注这样的偏离，开始理性认识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的作用，并强调经济学与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学理性良性循环。

我国哲学家张雄认为，如果将亚当·斯密建立起的古典经济理论体系视作经济哲学的发端，那么迄今为止，经济哲学的历史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8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初。那时的经济哲学主要融入在道德哲学与古典经济学之间的交流中。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和约翰·密勒(John Miller)。斯密提出经济个人主义与道德自利原则的结合；而密勒主张经济共同体精神与道德利他主义原则的结合。

第二阶段是从 19 世纪初至 70 年代。此时的经济哲学主要融入在历史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交流中，主要研究特点是，对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原理的解剖与批判，学者们从政治经济学领域外的问题研究着手，通过引入历史尺度、价值尺度和政治尺度，来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提供社会综合要素系统的理论根据。代表人物有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

第三阶段从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这时候经济哲学主要融入在经济方法论与哲学方法论之间的交流中。其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哲学为古典经济学建构其理论前提和审视其范式提供逻辑工具。代表人物是德国新历史学派领袖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和边际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门格尔(Carl Menger)。施穆勒直接强调归纳法在经济领域内的应用。门格尔则认为，必将哲学若把历史主义方法摆在恰当的地位，必将使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陷于衰落的境地。

第四阶段是从 20 世纪初至中叶，经济哲学开始融入在经济学与科学哲学之间的密切交流中，实质仍是关于方法论的讨论。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20 世纪冲击经济学的第一次思想浪潮来自科学哲学。一些经济学家从方法论的角度深入研究科学哲学，提出了经济学的本体论和价值论问题。证伪主义哲学家波普尔(Karl R. Popper)提出，必须把方法论的运用。这种解释向传统的经济学提出了挑战——有必要排除所有不能简化为微观经济学命题的全部宏观经济学命题。

第五阶段从 20 世纪下半叶至今，经济哲学融入在经济哲学与现代伦理学之间的交流中。借助于诸如选择、合理性、效用、福利等众多现代伦理学范畴和原理，经济学提出了关于社会秩序、经济人、市场和政府失败、市场、国家及道德范围等等学术理论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被公认为是“集经济学和哲学手段于一身，从道德范畴去讨论重要的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

近年来，经济哲学也是我国社会科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但与西方相反，经济哲学在中国是发端于哲学界的呼唤。而面对当今的多元社会，处于巨大社会变革中的中国，改革开放、制度转型等一系列棘手且复杂的深层次问题迫切需要解决，这就需要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积极合作，从而，既为经济哲学在中国的生存提供丰厚土壤，也为之提出新的使命。

■ 美加观潮

书店，正是称心消费黄金屋

◎ 何恒

加拿大的书店，真可谓是读书人的天堂。目前，加拿大的最大书店名叫“篇章”(Chapters)，这是一个连锁书店。

这个书店的面积很大，有好几个楼面组成。其中，还设有星巴克咖啡店、文具店及音乐书店等。在书店里，还有供读者阅读和休息的沙发和桌椅，甚至还有壁炉装点书店，这样的书店环境是相当舒适和优雅。

在书店里，许多人一般喜欢浏览各种书籍，但真正掏钱买书的人却非常少，因为书价实在太贵了。就拿一般的金融书籍来说，起码要花 60 加元甚至更多的加元才能买上一本书，折合成人民币要花费 450 元。

有一次，我偷偷地查看了一下周围人到底在看什么书，发现很多当地人在看饮食、装潢或园林花卉方面的书籍。这些书一般都有许多插图，价

格自然也很贵。我也注意到一些中国同胞都在看电脑书，也许他们在准备 IT 考试，也许他们在进修 IT。该书店有一项政策，如果你不满意所买的书籍，可以无理以退还。因此，一些人把书买回来后去复印，然后再还给书店。我的一位朋友说，他三天就把一本 100 加元的电脑书看完了，也就是说，他在三天内赚了 100 加元。

我也有每天在吃完晚饭后散步的习惯，但总是不知不觉地去附近的那家“篇章”书店，或者蹭书看，或者买杯饮料。偶尔，我也会买些书或文具，所以工作人员都认识我了。但我很少买光碟，不仅是光碟太贵了，而且我也不太喜欢流行音乐，因为大多数古典乐曲的光碟我都有了。

但有一次在看了两个白人姑娘演唱后，我还是忍不住买下了一张流行音乐光碟。那两个姑娘在推销她们的演唱专辑，或在台上表演演唱。这两个姑娘唱得非常动听，吉他和钢琴在她们的指挥下变得那么充满灵性，

尽管我不能完全听懂她们所唱的歌词，但我还是深深地被她们的歌声和音乐所震撼了。在她们结束演唱时，我就当场用 14 加元的现金而不是信用卡买下了她们的一盘演唱光碟。

我还有一个癖好，就是喜欢买文具。在书店里，有很多是印有“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文具，但我更对意大利、美国及加拿大等地出产的文具爱不释手。比如，皮质封面的日记本和木质封面的工作日志等。但这些东西国家出产的文具价格也不菲。这次回国前，我就买了一本皮封面日记本，每天我会上面都写下几行。不过，与其说我是在记日记，倒不如说我是想去感触一下那种特殊的质感。人的行为有时就是那么不可思议，这本皮封面日记折合人民币约为 200 元，这笔钱在加拿大超市里可以买上一大堆东西。

尽管如此，我还是比较喜欢逛逛书店，逛书店似乎已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时也会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喜悦和惊奇。